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1.020

种族、突变和消耗：西方生命政治中的异质化

黄罡

(广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从种族主义和战争维度切入,可为对西方生命政治中异质化的剖析提供独特视角,从而揭示在近现代欧洲历史进程中,生命权力在种族对抗和交融中所呈现的偶然性与多样性。现代生物种族主义的介入与生产和安全机制相交织,将生命权力从不同族类之间的对抗和融合突变为排斥、压迫乃至清洗。伴随着种族主义的突变,西方生命政治在法西斯化中,通过消耗式的主权形态,从压抑的现代生产机制中逾越而出,成为一种异质化且悖论式生命权力形态。

关键词:生命政治;突变;消耗;逾越;异质化

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1-0143-09

在后现代语境中,“生命政治转向”围绕着关于“流动、欲望和消耗”的活力论(vitalism),来逾越基于权利交换的契约理性、预先所指意义下的身份认同以及现代资本生产方式下的同质化危机,并揭示工具理性下主体性的压抑及规范管控机制对身体的规训、开发和利用。国内对生命政治研究的脉络梳理基本从生命政治思想史入手,剖析福柯和阿甘本之间的学理联系。关于“治理术”的解读则基于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对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转向”进行批判。再者,从装置及其部署(dispositif)的阐释着手对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局限性进行批判。最后,基于Lazzarato对福柯的解读,将与此解读相关的内格里和哈特提出的在非生产性活动下的“诸众自治主义”视为生命政治的派生理论。此文则从种族和战争的角度切入,侧重生命权力在欧洲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异质化突变,突显其对现代资本生产理性及功利性的逾越,并揭示“消耗”这一埋藏在西方生命政治中的隐性线索。

一 种族主义

福柯对“生命权力”的提出可追溯到1976年法文版《*History of Sexuality*》第一卷的结尾。“(在古典时期)为驯服(个人)身体和管控人口曾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技术,这标志着生命权力时代的开始。”^①此叙述虽略显突兀,却上承1975年法文版的《*惩戒与规训*》,与《*必须保卫社会*》相呼应,并下接《*安全、领土和人口*》与《*生命政治的诞生*》。这些文本基本勾勒了生命权力的演变理路。吴冠军从科耶伦到阿甘本对生命政治史前史进行梳理。而蓝江以《*癫狂与文明*》的叙述为基调,在知识考古学视域下,对生命政治的话语发凡进行整理,并基于现代生产机制对(伤寒)病人的隔离和规训,将生命政治视为西方(后)现代文明之殇^②。关于此对生命政治的谱系考察,福柯则是从种族战争的角度,在《*必须保护社会*》中对生命政治进行阐述。福柯将种族主义定义为“闯入生命权力领域的不速之客”。此不速之客不仅中断了生命权力在生物进化层面的连续性,而且将主权语境

收稿日期:2019-01-23

作者简介:黄罡(1982—),男,湖南邵东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批判理论、政治哲学及文化理论研究。

^①Foucault, M.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Robert Hurley (tran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1, p. 140.

^②吴冠军:《“生命政治”论的隐秘线索:一个思想史的考察》,《*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1期;蓝江:《*赤裸生命与被生产的肉身:生命政治学的理论发凡*》,《*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下的对敌斗争转化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异类威胁^①。此定义涉及两个要点:一是种族主义是生命权力在历史和政治演变中产生的断裂或突变;二是其与主权交融,并将后者从例外状态下的对敌斗争转为种族战争。基于这两点,福柯围绕“战争”和“种族”两个维度对生命政治史进行了谱系学考察。

其对战争的梳理源于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对比。马氏在《君主论》中将王与主权的的关系视为一种从外部附加的关系。也就是说,王权通过继承(传统)、获得(条约)或征服(暴力)来维系主权。无论在何种方式下,这种维系都是人为地通过技术、策略乃至阴谋使王的地位附着在主权之上,而不会体现主权的先验性^②。从此角度看,王权对主权的维系是很脆弱的。为了维系主权,王最关心其对领土和人口的统治。战争则成为有效的安全手段。直到16世纪的欧洲,王权之间的战争虽然已从生命政治的维度去维护人口和领土,但并未在马氏理论中看出战争与种族之间的明显关联。

对于霍布斯而言,王与主权的的关系不再是人为的,而是在神学维度将王对主权的延续视为其固有性。霍氏的政治神学继承了圣托马斯·阿奎那式的神学和宇宙观,将神、自然、主权和家庭置于一种连续性(theological-cosmological continuum)中,但又把主权政治的诞生视为和谐的神话时代的终结。在人统治人的时代中,当与神的沟通只剩下艺术和隐喻时,分歧和战争则成为权力运作的永恒主题。但霍氏认为战争并非源于自然差异,而是此差异间的均势或同质化。差异的存在看似会引发分裂和战争,但实难发生。要么强者依仗其优势会很快结束争斗形成绝对统治,要么弱者会选择屈服。所以,战争往往源于差异的消失,处于弱者不一定恒弱而强者不一定恒强的微妙均衡中,使其处于一触即发但未必发生的持续风险下,即战争状态(the state of war)^③。在此悬置状态下,暂时的弱势和强势方并不会轻易置身于你死

我活的厮杀中,而是通过策略性的博弈来展示力量并制衡对方。所以,霍氏所谓的战争并非在自然状态下将杀戮作为无节制的消耗,而是在博弈中成为一种虚拟的符号以表述对死亡的恐惧,目的是威慑。决定战争和裁决生死的主权也不是以屠戮为目的,而是以死亡的威慑来消解强弱间的均势,并在理性原则下基于权利契约的功利交换形成绝对的统治。即统治者把战争作为威慑从而能获得统治的权利,同时承担着保护被统治者的义务,而被统治者则放弃暴力、服从统治并获得安全。此权利契约关系也就无法摆脱一种从属性。

按照福柯的考证,主权战争在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中,与关于种族的话语形态的交织颇为复杂。即使在罗曼征服后,当罗曼人作为外来种族占领英格兰时,基于暴力征服的主(王)权交替也大多被表述为本土法与外来法,或英语和法语之间的交错。虽然通过法律和语言表述的身份政治掩盖了盎格鲁-萨克森人与罗曼人之间的对抗,但其种族间的斗争从未停止。而真正在生命政治层面将战争与种族连在一起的应该是在法国历史上日耳曼法兰克人(Germanic Franks)和高卢罗曼人(Gallo-Romans)之间的种族斗争。这也是福柯基于对Boulainvilliers的文献考证将战争与种族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切入点。

但是,当时欧洲内部的种族冲突还不能被视为现代意义上的种族主义。欧洲王权自中世纪以来最重视的是不断巩固其对主权的维系能力。当时的种族斗争实际上被建构为一种王族血脉与被统治族类之间的对抗。换言之,这种对抗一直被两种政治形态调和:一是基于法律和语言的身份建构,使不同族群能在血缘差异之外,于象征意义层面产生文化认同和交融,即民族的融合;第二种形态是“经济”介入到王权的对内治理过程中。如果我们从欧洲近现代文献中对“经济”一词进行考察的话,卢梭(Rousseau)在《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社会契约及其论说》的《A Discourse on Political Economy 论政治经济学》当中对

^①Foucault, M.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Mauro Bertani and Alessandro Fontana (eds.). and David Macey (trans.). New York: Picador, 2003, pp. 254-256.

^②Foucault, M.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Michel Senellart (eds.). Graham Burchell (trans.). New York an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91-92.

^③Hobbes, *Leviathan*, Richard Tuck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89-90.

经济作出的定义颇值得关注。经济(economy 或 Economy)一词源自 ογκ, 意为房子(house)和法律(νμo, law), 其最初的含义是“为了整个家庭的共同利益而对房子进行明智且正当的治理”^①。此处的“房子”是一个隐喻。其有两层含义: 一方面是指房子和如家庭成员般生活在房子里的人, 可被解读为财产、资源以及伴随其活动的人口; 另一方面, “房子”在 17 至 18 世纪的欧洲, 从空间维度上意味着范围、疆域和在此范围内财富和人口的所属关系, 即谁来管理房子并保护那些居住其中的人口及财物。这一层解读也就产生了另一个与经济活动息息相关的概念: 安全。换言之, 自西方近代起, 经济活动一直蕴含着政治的干预, 即在实现市场流动和社会繁荣的同时也要在一定范围内保障安全和稳定。所以, 在 18 世纪的欧洲, 当王(主)权与近代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相交织时, 经济大多是王权或政府在其管控的安全范围及所知疆域内实施的一种功利且有助于实现财富分配和人口流动的“技术”或“策略”, 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权力形态——“经济主权(economic sovereignty)”。虽然其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利己和竞争环境下倡导的放任自流(laissez-faire)相交织, 但这种重农及重商主义的放任自流仍将市场视为从属于主权且在经济活动中验证其公正的分配工具, 不同于之后在资本积累中基于个人规训和群体管控交织而成的权威规范(hegemonic normative), 也不基于生产功利性将市场视为国家理性干预下保证再生产效率的流通机制, 而是通过对王的劝诫以及对社会个体行为的引导和管理形成的一种如同父亲对家庭的“善治”和“智治”形态^②。从此政治形态看, 种族这一概念与“经济地治理家庭”这一表述是相互交织的。“家庭”从广义上讲是王权统治下, 其领土内所有的人、事和

物; 从狭义上看, 特指王族血脉在其控制领域内的家庭谱系传承, 以及此贵族血脉在维系其统治和平民的安定生活之间所建构的一种“政治经济(学)”关系。由此看出, 当时的种族及其冲突虽然已有血脉遗传性, 但并没有生物学及其相关知识体系的表述。尽管种族与经济和治理这些话语表述相交织, 但仍在一定范围内呈现出基于主权安全的非流动性。

真正让种族斗争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种族危机始于 19 世纪早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其伴随着欧洲内部的人口流动。此人口流动与市场机制下的商品、技术和资本流通密不可分, 同时也瓦解了传统王权在其统治下的主权安全。这种风险主要源于两个方面: (1) 无论是王权基于王法通过暴力的惩戒来维系主权, 还是国家理性通过规训机制对个体进行改造以维护生产, 这两者皆与警察机制相交织, 对社会群体及其流动进行全景布控式(panoptic)的“经济治理(economic government)”, 从而将王权的正当性和国家的合理性表述为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和主体的顺从。而市场机制下的自由流通则在主权、警察和规范机制所编织并监控的治理模式以外造成了权力及其知识体系的断裂, 并揭示出之前权威“善治”模式的局限性^③。(2) 这种局限性体现为人口流动的不安定性, 而此不安定性则形成了新的治理环境。新环境(milieu)意味着在主权或规训技术建构的安全空间之外出现了新的治安空间。而在人口流动过程中, 此治安面临着无数可能发生的不定因素和突发事件, 并需要通过新的技术、策略和部署来进行预防、引导和治理^④。

而在人口流动和不同族群相互交融的环境下, 资本所驱使的现代治理能否真正实现公共利益及社会安全则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在市场流通

^①Rousseau, Jean-Jacques, *Discour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1755), in *Œuvres complètes*, vol. 3, Paris: Gallimard,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64, p. 241; 英文版为 G.D.H. Cole 翻译的 *A Discourse on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Editorial Beni Noaj, 2007, p. 128. 英语原文为“The word Economy, or Economy, is derived from ογκ, a house, and νμo, law, and meant originally only the wise and legitimate government of the house for the common good of the whole family.”

^②Foucault, M.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Michel Senellart (eds.). Graham Burchell (trans.). New York an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94-95.

^③Gordon, C. “Governmental rationality: an introduction” in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 16.

^④Foucault, M.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Michel Senellart (eds.). Graham Burchell (trans.). New York an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20-22.

机制下,移民为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但他(她)们所遭受的待遇却截然相反。根据 Pinçon 和 Pinçon-Charlot 对 19 世纪英法两国移民的考证,巴黎人将自己视为高贵的法兰克人,而将从英吉利海峡对面迁居过来的“岛民”视为野蛮人,不过是当年被他们打败的高卢人的后裔^①。此歧视不只基于人种和身份,也来自公共空间的撕裂。移民的涌入在城市化进程中对空间进行了分割。他(她)们大多居住在工业城市的边缘地带,如同病菌一般被视为危险且肮脏的底层阶级。这种阶级身份的定义并不仅仅是经济层面上不平等的生产关系所造成的,也源于权威话语对此“低贱”的种族出生的规范表述。简言之,19 世纪工业资本的扩张引发急剧的人口流动,而此流动在种族交融下产生对立,进而触发安全危机,并撕裂了传统主权或警察管控所维系的社会形态。

但是,这种公共安全危机是否真正具备了引发现代意义上种族战争的条件?答案还不确定。直到 19 世纪末的欧洲,外来移民所引发的种族对峙和社会分裂与日俱增。本土文化及社会正在从内部被其他族类渗透,对抗不可避免。但这种对立也存在反向的融合。即在种族主义或反犹主义被大肆宣扬时,不同族类却能或多或少地融入彼此,形成一种共生关系^②。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异族通婚。也就是说,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当多样化的族类交汇时,冲突或战争也许难以避免,但两种方式可以缓解:一是通婚可以在生物学和遗传学上产生同化或共融^③;二是公共福利体系的建立可以从功利性上消解此对峙的政治化。

二 突变

如果种族伴随着冲突和融合,不同族类之间在生物和生理上的区分或隔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动,虽然这种变化往往滞后于通过语言、生活习俗和文化交融所产生的民族身份的变迁。尤其随着近现代人口流动,冲突或交融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其与市场流通环境下社会流动的不定性紧密相连。从此角度看,欧洲

近现代的工业化、城市化和资本化是否必然引起生命政治意义上的种族战争或清洗?根据现在的剖析,并不一定。但为什么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在阐述英法种族冲突后,跳过整个近现代工业史,突然涉及纳粹主义的种族战争呢?

首要原因是他将纳粹种族主义视为西方生命政治演化过程中的突变(a paroxysmal development)。就像方才所述,种族之间有冲突也有交融,这是一个偶然和不定的过程。但如果将这种偶然和不定性强行导向一种必然性,即冲突是必然的,那么一定是特定政治力量以种族主义形态介入的后果。其编撰一套科学且统一的知识体系,从生物及生理上将种族自起源便遗留在个人身体上的印记或符号,比如皮肤颜色、眼睛大小、额头高度等进行测量、统计和归类,再依据此归纳总结好的数据对整个社会群体进行渗透、筛选、跟踪和监控,以形成一套标准的人口鉴别规范。再将筛选出的异族人口从现有社会及权利保障机制中分离出去,并加以严格限制,最后妥善地处置掉,以达到种族净化之目的。这也是福柯将种族主义与之前历史中的种族斗争加以区分的原因。也就是说,只有当国家机器不再成为种族间进行对抗的工具,而从属于某一种族并保护其纯正性和优越性时,现代种族主义才就此诞生。换言之,只有当种族净化企图取代异质族类之间偶然且持续的对抗和融合时,种族主义才会产生,历史也就此发生突变,并改写为现代意义上的生物种族主义(biological racism)。

更值得注意的是,种族在漫长的生命进化和历史演变过程中是不断分化和融合的。无论是隔阂、通婚还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或随着环境的改变、时空的转换以及疾病或病毒的演变,都会引发不可控的基因突变,最终被身体记录并表现出来。从这一角度来看,如果把种族与基因遗传以及身体表现相联系,那么复杂、偶然且不可控的生命进化也会使种族形态的表现显得极为复杂。而被特定权威表述并规范的生物和遗传科学知识体系往往基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乃至神话或谜语在话

^①Pinçon, Michel. and Pinçon-Charlot, Monique, *Sociologie de Paris*.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4, pp. 28-29.

^②Pichot, André, *The Pure Society: From Darwin to Hitler*, trans. David Fernbach. London: Verso, 2009, p. 287.

^③Pichot, André, *The Pure Society: From Darwin to Hitler*, trans. David Fernbach. London: Verso, 2009, p. 289.

语中的传承,并将这些神秘主义的话语传承与本族的身体特征进行象征性地结合,再通过生命科学知识体系加以标准化。比如,纳粹主义认为日耳曼人是雅利安人的后裔,最接近神的种族,而这种话语与瓦格纳在《尼伯龙根的指环》中对北欧神话中诸神的描述及隐喻相呼应。再者,自 19 世纪中后期大量关于“起源”“进化”或“物(人)种”的科学和人类学术语出现,并从生物和化学维度基于对人体血液的研究,将血型的划分与种族相联系^①。从这些角度看,种族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有意识地通过生命政治来切断不同种族在生命遗传和进化过程中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异质性。而种族战争则成为此生命政治的必然结果和最终途径。这种断裂也意味着异质种族间冲突和交融的偶然性在种族战争的必然性下被表述为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不规则性(irregularity)。比如,纳粹德国不仅在法律上禁止本族人与犹太人通婚,更在人种学和优生学所建构的知识规范下将其视为一种类似于疾病,且危害种族纯正,并在遗传上导致族类生命健康退化的异常行为。

如果种族主义旨在防止生命进化及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种族异质性,那么纳粹主义的生命政治则将种族主义突变为对整个社会机体的最终净化。如鲍曼所言,纳粹主义是自西方理性启蒙以来就隐藏在其现代性中的内在可能性^②。此可能性的实现与法西斯式的政治美学密不可分,而这种政治美学恰好在战争和种族主义的维度上体现出来。其将政治作为战争的继续,目的是在同质且功利的生产积累以外,通过全面战争以暴力和毁灭来逾越工具理性的束缚,并在反人道主义下促使生命权力的异质化。对异质族类的清洗则成为此异质化过程中必需的消耗品。

值得注意的是,此种族净化在同质化生产、压抑且规范的社会监控以及主权裁决之间,呈现出一种多形态化的分布。这种多形态化意味着生命政治是在主权统治关系以外的另一种异质性权力关系。其在法律等权利机制以外,将安全威胁视为在保障社会机体健康和种族纯正过程中,源于

生物或生理层面的“危险因素”。在这一前提下,对单一族类及其人口健康的安全保障不仅与之前的权力技术不同,且具备不一样的知识表述。按照福柯的论述,这种生命政治下所编织的新的权力知识网络,将宏观上对社会群体生命质量和权益的保障与微观上部署在生产机制中对个体进行限制和改造的规训装置相交织,形成新的技术策略,从而将生产和健康融合在一起。然而此规范体系却是以族类区分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此规范一方面是对生活及安全的保障,而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种族主义对生命进行分化和筛选。纳粹种族主义的突变正是由于其在生产与健康的权力知识体系中,加入了生物学上区分种族优劣和遗传学上维系种族纯净的知识,从而在生产、公共健康和种族筛选之间形成了多形态的权力知识体系。

基于以上论述,种族主义被视为在现代国家理性支配下,将主权和规训权力相交织,来处理那些被权威规范所排斥的异质性生命形态的新技术。集中营的发明可被视为新的技术装置。其部署大致拥有三种功能:关押、劳改和灭绝。这三种功能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前后相连,以灭绝为目的,即关押和劳改只是灭绝的过程和手段。这一特点也将集中营与诸如监狱之类的装置部署区分开来。监狱在西方 18 世纪的诞生有部分是基于对宗教裁判所性质的精神病院的改建,并将精神病人与犯人分开治疗和改造(前者通过家庭,宗教和医生来规训,而后者通过监视、标准化的劳动以及忏悔来改造)。其根本原则是基于生产功利性将社会异己分子,比如:病人和犯人,纠正并转化为对生产社会有用之人。但集中营则将种族净化凌驾在生产及其功利性和理性之上。尽管集中营也具备关押和劳改的机制,或者说,在被关进集中营之前,异质族类已经历过驱逐(从原来居住地驱赶出来)、分割(通过生产功利性对人口进行分类和筛选,哪些是有劳动技能且健康可用的,哪些是老弱病残或无“实际”用处的)和限制(固定居住区域)等过程。无论是在集中营外还是集中营内,这些种族清洗中所谓“科学且规范”的流程

^①Weindling, P. *Health, Race and German Politics between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Nazism 1870-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464.

^②Bauman, Z.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Polity, 1989, p.7.

虽然仍把生产机制引入其中,但营中的劳动绝不等同于传统监狱以再社会化为目的的劳动改造,而是不断产生赤裸生命,并将其劳动转化为单纯的消耗,目的只有死亡。

三 消耗

由种族主义引发突变的生命政治重新与主权机制交织,并将“让其活”的生命治理导向以种族清洗为目的的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而阿甘本论述的赤裸生命则被视为这种死亡政治中最合适的样本。毫不夸张地说,“赤裸生命”已成为生命政治在种族主义介入下对生命的流动和释放进行捕捉、压抑乃至毁灭的代名词。尽管福柯主张将这种暴力视为(纳粹)种族主义引发的突变,但阿甘本却将此暴力视为一条始终潜伏于西方权力演化脉络中的“暗流”。而这条暗流也与“消耗”这一概念密不可分。也就是说,生命政治正在转变为一种消耗的政治。对主权进行维系的生命权力正在占据异质且多样化的生命进程,并将其沦为暴力驯服、改造和浪费的“竞技场”。这种为消耗而存在的政治形态作为西方现代性中“非压抑的反叛”,试图逾越生产理性以找回重新进入主权例外状态的新端口,而这种逾越(transgression)极易与法西斯主义交汇。如果权利契约关系和权威价值规范把生命权力表述为安全、保障和压抑并存的形态,那么这种逾越所关心的则是生命权力如何运转、流动、变化和消耗的过程。且这一过程不只是对生命的占据和捕捉,更是对其内在能量的无尽释放和超越。生命政治中关于这种能量本体论(energetic ontology)的论述不得不回到巴塔耶。

尼采用“锤子”来检验西方形而上传统之“空洞”时,不仅在其最后一丝喘息(the last breath)中终结了基督教神学话语体系及先验理性所表述的上帝符号,更旨在僵化且衰老的文明机理中唤醒久违的生命张力。巴塔耶则在“上帝死去”后,揭示了后人类在感官世界中消耗和沉沦的虚无命运。对于巴塔

耶提出的普遍经济学(the general economy)而言,“绽放即美(exuberance is beauty)”。“绽放”意味着“过度(excess)”。过度则是不加节制地消耗生物体所蕴含的无穷生命力,通过此释放过程从功利的劳动生产及财富积累中溢出,直至毁灭和死亡,从而实现主体从同质性生产和工具理性的压抑向异质性美学的超越。在巴氏看来,过度才能重新审视现代经济生产的局限性。后者总是功利地将主体内在的生命意志表述为劳动力,再通过政治的方式逼迫劳动(再)生产和交换(这一过程往往是同质且抽象的),却忽略了生命本身在重复生产和辩证逻辑范式之外所固有的创造力。故现代性不仅是压抑、生产和积累,也是疏导、释放和消耗^①。从这一角度看,西方生命权力被视为源于多神崇拜时代,且之后被基督教的圣经意识(the Bible consciousness)所排斥的古老而神秘的能量实体。这种力量源泉以健康且精力充沛的身体为渠道,并通过那些被人文传统、理性启蒙和基督教式的忏悔及赎罪所禁忌的方式,来逾越基于功利生产的经济表述。一旦以逾越为目的的消耗要颠覆被理性、伦理和功利所施加的禁忌,那么这一过程必然是非生产性的。损耗、毁灭、浪费或死亡这些被现代理性规避的危险则成为其根本原则,并以此轮回至生命的自然性和动物性。

而作为西方现代性的突变,法西斯式的生命政治表现出对战争的渴求、对超级领袖的崇拜、对超越美学的崇尚、对自由主义趋利性的排斥以及对资产阶级自我节制和斤斤计较的厌恶。这些都使其与现代生产理性背道而驰,并与过度消耗的普遍经济学密不可分。这种关联性使法西斯主义既反对将国家视为维系并改造生产关系的工具,也反对自由主义式的议会宪政。因为后两者不过是以同质化的生产机制、市民社会中功利且离散的利益纠缠和权利代理机制来取代主权关系,既以国家理性来消解个体通过其固有生命意志所进行的自我肯定^②,又通过少数代表基于经济原则在议会中的

^①Bataille, G.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 I Consumption*, trans. R. Hurley, New York: Zone Books, 1991a, p. 23.

^②Bataille, G.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Fascism", in *Georges Bataille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1939*.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5, pp. 137-139.

“私下”讨论来代替公共领域中的人民意志^①。从这一角度看,并不是大多数通过少数代表来发声,而是同质化工具理性机制的自我表述。这种同质化是不稳定的,因为难以同时满足并同化其内部所有的差异性和不均衡性。因此,对同质化的维护也是对其不可表述的非同质性的排斥或压制。法西斯式的政治逾越就是要把生命权力中那些不能被同质性安全机制及其规范所吸收的异质性因素或力量从压抑中引导并释放出来。

乍一看,生命权力中的异质性与压抑的同质化机制是分离且相互排斥的。但是,法西斯式的生命政治之所以能在现代性的否定面(消极面)上如同恶性肿瘤般产生异质突变,并不是因为分离和排斥,而是源自一种共生关系。换言之,异质化的生命政治一直伴随着西方现代性并深植其中,被后者所固有,只不过在突变前一直被后者掩藏、包容和压抑。异质性的突变、反抗和逾越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发生。现代生产及功利机制也不会一开始就完全排斥异质性的产生,因为同质性生产及其分配的不稳定和不均衡性必然伴随着个体需求在生存必要性之上象征层面的多样性、生活体验的差异性、乃至无法被功利生产及消费满足的异质性。虽然这种多样化乃至异质化的需求与同质性生产机制并不兼容且交错而生,但后者在相当程度上却设法通过其所能管控和接受的方式来妥协、安抚、引导并控制前者,这一过程也是异质性力量否定和压抑自我的过程^②。而法西斯主义的介入就是要以同质性机制所禁忌的方式,通过消耗将异质性力量,从压抑和同质化的限制中逾越出去。

这种消耗和逾越不只是像朗西埃那样在美学上创造新的感知,从而建构新的政治空间,塑造充满想象力的政治主体,而是要将整个现实世界及其伦理规范以政治美学的方式置于肉体消耗(corporeal expenditure)中^③。而在法西斯的生命

政治中,这种肉体消耗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种族清洗。其首要特征是通过主权来异质化。对于巴塔耶而言,主权所呈现出来的绝对个体形态,比如:王或超级领袖,就是一种异质化。无论是王权还是独裁,对于它们承载主权的固有性而言,是拒绝服务任何同质性和功利性原则的。即主权来源于永恒战争,是通过生命意志的流动、释放和消耗而决定的主宰关系,不是对某种协商或妥协政治的继续。虽然其可以将“让其生”的权力出让并代理为“让其活”的权利,但更重要的是要保留其决定死的权力,并能通过战争和消耗将“让其活”的权利撤销。从这一角度看,这种反功利性的异质化也将黑格尔的“主仆辩证法(dialectics of master and slave)”极端化。如果主宰意味着斗争和风险,奴仆则安于现状且享受安逸,那么从功利角度看,这两者间的转化难以摆脱一种奴仆意识。换言之,为了超越而不得不进行的斗争和承担的风险一定不能过度,否则不仅不安全更不能享受成为主宰的“实惠”,即使不得不面临生死考验,也要死得其所,升华为牺牲^④。而法西斯化的政治美学则对此主仆辩证关系进行矛盾地扬弃。一方面,基于此关系并将其庸俗化,以渲染国家暴力并使其升华为一种神圣性;另一方面,又摆脱此辩证关系的功利维度和奴仆意识,不再将暴力的使用表述为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比如:通过牺牲获取的荣耀,而是超越预先给予的意义范畴,并面临虚无,即无意义的消耗。种族清洗便是典型。其不是牺牲,也不再具备某种神圣性,而是将肉体消耗降格,并与那些禁忌乃至被诅咒的异质性相连,比如:那些污秽或卑贱之物^⑤。这种通过禁忌的消耗对神圣性的降解被阿甘本视为主权在法西斯政治神学视域下的悖论。来自世俗的生命在神圣与污浊(profanity)之间被冠以神圣之名,并从法律保障的权利机制中排除出来,但又因为生命

^①Schmitt, C. *Constitutional Theory*, trans. and ed. by Seitzer Jeffre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72.

^②Bataille, G.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Fascism", in *Georges Bataille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1939*.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5, pp. 140-141.

^③Yusoff, K. "Biopolitical Economics and the Political Aesthet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10(2-3): 73-99.

^④Derrida, J. "From Restricted to General Economy, A Hegelianism without Reserve". *Writing and Differ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lassics, 2001, pp. 322-325.

^⑤Bataille, G.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 II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 Vol III Sovereignty*, New York: Zone Books, 1991b, pp. 217-222, 377-379.

已被神所遗弃的浊世所染,故其污秽的出身又再次被神圣性排斥而拒绝其升华^{①②}。

这种在种族清洗中与污浊共生的肉体消耗进而在感官世界中按照异质性的二元对立,以两个极端进行分类:同质性不可触碰和吸收的神圣和污秽。而此二元性也在异质化政治中,将异质族类与对敌人和异常人的处置区分开来。敌人是对外而言的。施密特将对敌斗争视为主权从宪政机制和技术及商业社会中再次政治化和神圣化的绝对要素。敌人(或者说公敌)是不可被吸收、取代和同化的,而只能是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存在的异质性。而且对敌斗争是将生命权力的消耗,比如暴力和死亡,进行升华,使其成为牺牲的过程。所以,敌人的存在是将军事和宗教结合在一起,通过异质化将政治往神圣一面进行超越的过程^③。与敌人相比,异常人是对内而言的社会异己分子,比如罪犯和病人。自17世纪后,欧洲对罪犯和病人的处理更多基于生产,在理性计算下,通过规训以及再社会化将这些异己分子视为可被治疗、改造和同化的对象。而基于种族清洗的生命政治,则产生了另一类异质性的生命消耗。其被安全保障机制所排斥,可被主权肆意处置,却不以对敌斗争来对待,因为对他(她)们所施加的暴力及其死亡并不是通过斗争和牺牲来进行升华的过程。对他们的处置也不同于可被规训、治愈和改造的社会异己分子,而是在主权消耗下被现代国家机器“妥善”处理且不可触碰的“排泄物”。

结论

在这种既不算牺牲也不是谋杀的双重排斥中,如阿甘本所言,主权既通过法律对内保障权利契约关系,又逾越在外以例外状态将生命从权利

中剥离并暴露在自然法则之下,使其看似被神圣的隐喻所感召,实则则是被国家机器消耗的赤裸且污秽的生命。对于巴塔耶而言,这些“消耗品”不只是国家安全机器施虐的对象,而且成为法西斯生命权力异质化的端口。其以神圣之名,通过种族净化的形式,将生命权力的突变从其与同质化机制的共生关系中溢出,成为一种在神圣与污秽之间相混合的异质权力形态。神圣性往往在军政教合一的情况下,通过个人崇拜将牺牲、奉献和神迹诸如此类的异质性聚集在国家机器之上;而在此“神圣光辉”下,则是被异质化的生命权力消耗并排泄出来的“残渣”——在集中营里被诅咒的异类、毒气室里如同牲畜般被处理的赤裸生命。如同猎杀动物般生命消耗在功利原则之外,将禁忌的动物性(animality)纳入生命政治的突变中,通过对动物本性的回溯,并在对动物性的恐惧面前,揭示出西方现代性对此生命源头所赐予的“礼物”的排斥。极其讽刺的是,纳粹的种族战争却将伴随着死亡和污秽的动物性表述为一种超越,以摆脱现代工具理性对生命本性的限制,但又将这种超越的“神圣过程”回归动物性^④。对于这种将神圣归于动物性之上的悖论权力形态而言,所谓神圣的就是从外在感知的,自生命伊始即如同动物野性般存在的内在体验^⑤。

此内在体验在纳粹主义的生命政治下实现了神秘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结合。神秘主义在反基督的隐喻下促使国家意志转向日耳曼本族的神话源头。而种族主义则在前者的隐喻下将神圣性降解为对异族生命的消耗。但种族主义下的赤裸生命是否为生命政治的必然后果?福柯认为种族主义是生命政治演化过程中的突变,是极端政治在现代生产理性的压抑下的独特“发明”,而非普遍必

①Agamben, G. *Profanations*. trans. Jeff Fort. New York: Zone Books, 2007, pp. 73-78.

②吴冠军:《阿甘本论神圣与亵渎》,《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3期。

③Bataille, G.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Fascism", in *Georges Bataille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1939*.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5, pp. 150-153.

④正如巴塔耶所言,“一方面超越自我的(理性和功利)局限,另一方面又以某种方式将这种超越回到本我之中(动物和自然性)”。Bataille, G.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 II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 Vol III Sovereignty*, New York: Zone Books, 1991b, p. 14; pp. 112-113, 116-119; p. 131; pp. 217-222; Bataille, G. *Accursed Share*, vol. 1, trans. R. Hurley. New York: Zone Books, 1991a, p. 69; Yusoff, K. "Biopolitical Economics and the Political Aesthet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10(2-3): 82; Privitello, L.A. "S/laughter and Anima-lethe", in S. Winnubst (ed.) *Reading Bataille Now*.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67-196.

⑤Bataille, G. *Accursed Share*, vol. 1, trans. R. Hurley. New York: Zone Books, 1991a, p. 189.

然规律。但这引起了阿甘本的批评。对阿氏而言,微观权力剖析揭示了主权司法范式之有限,并通过谱系学抛弃主权中心论,将权力的流转从普遍且同质的表述中解脱出来,分布在那些被压制的异质性及其话语碎片之间的对抗与转化中,却忽略了集中营作为 20 世纪西方极权主义下生命政治的典型。福柯认为现代种族主义乃生命权力的突变正是此权力观所产生的认知结果。阿氏则认为对裸露生命的剥离和生产源于西方政治的原始架构,且早已融入当下以保障神圣人权为口号的西方政治生态中。

面对这种生命权力演化过程中的困境,当代西方左翼思潮寄希望于某个弥赛亚事件的降临,把后人类从法西斯式的异质化以及金融资本的权威规范中解脱出来。正如 David Macey 所言:“权力不能被单一权威关系中心化,也不能被某种颠覆运动所把持并成为其工具,而是一个开放、动态且多样化的知识技术网络,并将异质性的权力关系永远置于对抗和交流之中。因此,权力是一个

在反抗中无限流动的过程,无处不在也无处可逃,同时创造着反抗的主体。按照这一标准,生命权力不只是否定、捕捉和压抑,对于那些激进的政治形态而言也是极具逾越和‘创造’性的。”^①对于现代种族主义而言,此逾越不仅将历史中种族对抗及其融合的不定性单一化为压迫和排斥,更伴随法西斯主义,于同质性的生产机制和国家安全机器之上,通过主权的消耗,从同质且压抑的现代性中溢出,成为异质化的生命权力形态。这种突变的权力形态悖论式地将神圣渲染于污秽之上,所呈现出来的隐喻不再是先知在迷途中引导“羊群”,而是反基督者在“猪圈”里癫狂地发泄。但此异质化忽略了生命政治中权力机制的多样性和制衡策略。生命政治在与主权技术交织时,也不断在各种境况下产生不同权力关系及其技术策略的分化和对峙,既反抗主权关系下的排斥和消耗以及权威规范下的压抑,也可调节以反抗之名的过度逾越。

Race, Mutation and Expenditure: Heterogeneity in Western Biopolitics

HUANG Ga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It illuminates a unique vision to dissect the transgressive heterogeneity hidden within the western biopoli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acism and warfare. This paper draws on such a vision to reveal unceasing mobility of the different races opposing and mingling with each other during the recent and modern history of Europe, by which the biopower transforms in multiplicity as precarious and aleatory. The biopower is broken up with the former trajectory of transformability, or diversity, but mutated into a unidirectional exclusion, oppression and even cleansing, while the biological racism is epistemically intervening into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and technically interwoven with productive mechanism and panoptic disposition for security. Along with this mutation, the western biopolitics is intensified with the Fascism through the immoderate expenditure of sovereignty, to transgress the productive imperative of utility and rationality, also overflow from the repressive modernity, to blossom its metamorphosis in the paradoxical form of biopower.

Key words: biopolitics; mutation; expenditure; transgression; heterogeneity

(责任校对 莫秀珍)

^①Macey, D. “Rethinking Biopolitics, Race and Power in the Wake of Foucault”,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09(6): 186-205.